

## 新疆绿洲文化变迁述论<sup>〔\*〕</sup>

○ 王继青, 杨绍固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人文学院, 新疆 和田 848000)

**〔摘要〕**新疆自古就是多文化、多民族生活的地区,其中绿洲文化是当代维吾尔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以维吾尔族源为线索,梳理不同时期的绿洲文化及其特点,在空间上,以“西域”区域内的古代诸民族文化到回纥时期的草原文化以及蒙古草原文化的注入为论述重点,探讨不同时期的文化对新疆绿洲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源远流长的绿洲文化其基本精神是开拓进取、自由开放和诚信朴实的,其变迁反映了这个民族适应自然、追求文明的表征,文化的变迁中包涵有一种百折不回的韧性、一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一种包容和变革的创新意识。

**〔关键词〕**新疆;绿洲文化;影响;特点

新疆绿洲文化是活跃在新疆的诸多民族在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创造的、以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生态型文化,是一种由多元因素构筑而成的开放、动态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sup>〔1〕</sup>维吾尔族现在是绿洲农耕民族之一,但其民族文化中存在大量的草原文化和农耕基因,这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地理条件的限制。有许多曾在西域从事游牧生产的民族都融入到了维吾尔族的影响之中,他们必将其占统治地位的草原文化或多或少遗存在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活中。阿勒泰山、天山、昆仑山的山谷地带有大量适宜放牧的草场,这些地方不适合农耕,至今仍有一部分维吾尔人在此从事畜牧业生产。

准噶尔盆地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天然草场,历史上曾有匈奴、

---

**作者简介:**王继青(1971—),法学硕士,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双语教学研究;杨绍固(1977—),和田师范专科学校人文学院讲师,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本文系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科研费专项资金项目”(SWU1509203)的成果。

柔然、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此建立政权。这些民族在力量衰减后一部分向南迁徙，最后融入新疆广阔草原文化之中。在准噶尔盆地游牧的草原民族都曾和维吾尔先民有大量交往或者曾统治过西域大部分地区，他们的文化肯定会对维吾尔民族文化习俗产生影响。

### 一、新疆绿洲文化是西域历史文化的继承

天山、阿勒泰山、昆仑山等地都发现了持弓箭的人和各种动物的狩猎岩画，这说明当时的经济是游牧经济，人们通过刻岩画祈求畜牧的丰产。<sup>[2]</sup> 这些岩画作者的后代大部分都融入到了维吾尔民族中。部分游牧于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塞人、乌孙人、月氏人和部分游牧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羌人、车师人融入到维吾尔民族中，其草原游牧文化也会或多或少地遗存到所融入的民族中。乌孙人、月氏人原先游牧在河西走廊，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向西迁徙到伊犁河流域，他们的迁徙导致了游牧民族塞人南下建立休循国、捐毒国。

塞人是游牧和狩猎并重的民族。在公元前 5 世纪左右的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塞人饰物，表现最多的是各种动物，如马、绵羊、牛、骆驼、鹿、狮、熊、鹰、蛇等。<sup>[3]</sup> 一般来说，因为不断迁徙，游牧民族喜欢携带方便且贵重的黄金。塞人的金属加工工艺很高，加工大量富有特色的金器，纯度也很高。<sup>[4]</sup> 和田出土的中世纪文书，其语言与塞语有密切关系。<sup>[5]</sup>

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sup>[6]</sup> 生活是“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sup>[7]</sup> 其饮食、衣服、住房都使用畜牧业产品制作，衣着与匈奴人“衣其皮革，被荫裘”的习俗完全一致。

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sup>[8]</sup>，“多好马，有大尾羊”<sup>[9]</sup>。伊犁河流域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月氏人发展畜牧、狩猎和部分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其牧养的牲畜主要以马、牛、羊为大宗。月氏实行“蒸母”“报嫂”的收继婚俗。月氏葬俗中，殉牲为一大特点，以殉羊为大宗，其次是马、牛，多则 10 余具，少者 1 具，大都置于墓葬填土的右前方，头部一致向北。<sup>[10]</sup>《凉州记》记载月氏人“夏写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sup>[11]</sup>可见，月氏人经常将畜乳加工成奶酪、酥油、干奶酪等各种制品。

塔里木盆地边缘的游牧国有无雷、桃槐、蒲犁、山国、婼羌、东且弥等 21 国，这些游牧国“其种类羌氏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sup>[12]</sup>，“衣服类乌孙”，大都是羊毛编织和羊皮缝制的，“养牝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sup>[13]</sup>。春、夏、秋三季转徙草场的时候一般居住在用牦牛毛或羊毛缝成的帐篷里。冬季住在各牧场的平顶土屋里。土屋用红柳树枝编成围墙，外涂草泥，有别于乌孙和匈奴。<sup>[14]</sup>

匈奴强盛时直接统治天山以北草原，西域诸民族都曾受其控制，那么他们必然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sup>[15]</sup>，牲畜是他们的财富和生活资料，而且也是主要的生产资料。牲畜的数量之多是其他民族所不能相比的。狩猎在匈奴的经济生活中也占重要地位，匈奴人“儿能

骑羊,引弓射鸟鼠;少子则射狐兔,用为食”<sup>[16]</sup>,不分社会地位高低进行联合围猎。

秦汉时期西域诸民族的绿洲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有的以游牧为主农耕为辅,有的以农耕为主游牧为辅,有的逐渐转化为单纯的农耕文化。月氏西迁中亚后,在大夏居民的影响下,逐渐适应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社会经济模式。其饮食也有了转变,以粮食和肉食并重,并辅以各种水果、蔬菜。<sup>[17]</sup>极少数的塞人从事农业生产,主要种植黍并采集大麻做烟草。<sup>[18]</sup>

秦汉时期西域诸民族的绿洲文化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准噶尔盆地周边草场众多,游牧方便,但在干燥、多风沙的塔里木盆地边缘草场较少,畜牧业生产存在困难。塞人、乌孙、月氏等民族都有部分从伊犁河流域迁徙到南疆地区,在地域环境影响下由游牧转变为绿洲农耕,其文化形态也发生较大变化。虽然塔里木盆地边缘居民大多以农耕为主,但由于受到外来游牧民族的影响,这些游牧民族或者曾统治该地,或者融入当地居民中,其文化习俗必然或多或少遗留在后世的文化生活中,笔者认为这是后世西域居民能够较快接受和适应不同迁人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8世纪游牧于漠北草原的回纥人曾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744-840年)。汗国瓦解后,分三支西迁。西迁后一部分回鹘人曾以吐鲁番为中心,联合当地操焉耆龟兹语的民族,建立了高昌王国。以后又融进了古代中亚一些民族及吐蕃、契丹、室韦等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维吾尔族。

9-12世纪,维吾尔族社会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游牧经济逐步转为农业经济。天山南北的绿洲上人口稠密、商业发达。12世纪末,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维吾尔族世代信奉的萨满教、摩尼教及在天山南北流行的景教、祆教、佛教等宗教。伊斯兰教化推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一和文化的发展。从12世纪起维吾尔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政权控制。

13世纪,蒙古兴起,取代了西辽的统治,维吾尔族人民又归蒙古察合台及其后裔建立的察合台汗国统辖。15世纪在塔里木南缘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史称“叶尔羌汗国”。17世纪下半叶,蒙古卫拉特准噶尔部控制了汗国实权。18世纪中,清朝为统一全国,派大军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

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又在该地区实行郡县制、扎萨克制和伯克制,采取兴办屯垦、发展商贸、降低税率等一系列措施,维吾尔族社会因而有了较大发展。1884年维吾尔人民居住的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正式成为清朝的行省。维吾尔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其实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同人类社会许多民族一样,曾经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历程。维吾尔族的先民丁零、铁勒、高车和回纥人(后称回鹘人)曾先后融合了漠北草原和中亚属于不同语系和人种的古代部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吸取了活动在新疆的古代东伊朗语诸部(即通常所说的塞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其他突厥部族的文化,最后形成现代维吾尔族。

## 二、新疆绿洲文化是西域历史文化的融合

维吾尔民族的重要族源是曾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回鹘人。回鹘原名回纥,唐贞元四年(788年)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其历史向上可以追溯至两汉时活动于漠北高原的高车丁零,“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sup>[19]</sup>。“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sup>[20]</sup>。其风俗“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侵逃,不安资粮而饮食足。”<sup>[21]</sup>“蹲踞媠黠,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多为荣……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俗不洁净。喜致震霆,……人持一束柳枝回,曲竖之,以乳酪灌焉。妇人以皮裹羊骹,戴之首上,紫屈发髻而缀之,有似轩冕。”<sup>[22]</sup>

回纥隋唐时是突厥别部,史书曾称其为袁纥、韦纥,其民“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sup>[23]</sup>在回纥的畜群中最多的羊,但最重要的是马,回纥马体型中等,长于奔驰。马既是回纥人的交通工具又是作战装备,还提供马奶、马肉、马皮等生活资料。回纥人用马同唐朝交换粮食、丝绸和茶叶,“始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sup>[24]</sup>家庭手工业以制毡、鞣皮、马具为主。作为铁勒一支的回纥婚俗与突厥不同,“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葬俗也与突厥有大的差异,回纥“死者埋殡之”,而突厥火葬。<sup>[25]</sup>

唐开成五年(840年)漠北回鹘被黠戛斯击败,大部西迁西域。部分西迁回鹘人投奔葛逻禄,后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了黑汗王朝,举国改信伊斯兰教,由游牧民逐渐转变为农民。<sup>[26]</sup>部分西迁回鹘人进入原唐朝高昌地区,建立高昌回鹘王国。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而宣告南疆塔里木盆地民族变迁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sup>[27]</sup>高昌回鹘西迁之初,汇集在天山东段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山麓草原上逐水草放牧,畜牧业仍很发达,主要养马。高昌王、王后、太子各有马群,在平原放牧,前后相继长达100多公里,以毛色分群,不知其数。贵族食马肉,平民食羊及野鸭、雁等。<sup>[28]</sup>高昌回鹘既有本身独特的文化,也颇受高昌地区传统汉文化的影响,因“高敞(昌)本汉土”<sup>[29]</sup>。9世纪末,高昌回鹘的主体生产方式逐步转入定居农业,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商业并重的社会经济结构。受往日游牧习俗的影响,定居的回鹘人也没有切断和畜牧业的联系,“俗好骑射”,饮食上离不开肉、奶及其制成品,外出习惯以马、驴代步。高昌回鹘喜欢将乘骑的马饰以大大小小的缨络、小铃和皮条,装饰得非常华丽。<sup>[30]</sup>单轴高轮马车也是他们常用的交通工具,车厢上有拱形顶篷,前、后只用布幔遮着。<sup>[31]</sup>无论是高昌回鹘人,还是哈刺汗朝人,都喜欢食用马肠,进餐时使用餐巾,用羹匙喝流质食物,用餐刀吃肉,这些都是对以前草原文化生活的传承。

西迁后,回鹘人要对高昌农区城镇的不同民族进行有效管理,就不能实行漠北时期游牧式管理机制。东天山面积有限的牧场和回鹘人口的增长也存在着明

显的矛盾,需要他们转变生产方式。尽管高昌回鹘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但对其前辈的草原文化还有较多的继承和保留。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接受外来宗教以前,几乎都有一个多神崇拜和信仰萨满教的历史过程,高昌回鹘人也不例外,尤其是萨满教对回鹘人的影响既持久又深厚。<sup>[32]</sup>高昌回鹘存在根据传统进行统治的思想:回纥君主被颂扬为“上天”或“月亮神赐予神授能力”,高昌回鹘君王也被赞美为“太阳神和月亮神赐予神授能力”。<sup>[33]</sup>

回鹘西迁时,唐朝原高昌郡的大量汉人“人心苍忙,收拾不着,不得本来”<sup>[34]</sup>,这些人及其文化都融入到了回鹘人及其文化中。从吐鲁番出土的《工笔画》木板印刷物碎片旁附有汉文名字和称号,回鹘贵族男子的帽子都用一根红带子像汉人一样系在下巴。<sup>[35]</sup>

高昌还有许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畜牧业经济离不开商业的辅助,回鹘人在漠北时粟特商人就曾经营回鹘同唐朝之间的“绢马贸易”。西迁后,高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回鹘人受粟特文化的影响,也染上了不少商业气息。

高昌回鹘人既继承了自身的草原文化传统,又对其他民族文化在吸收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一种游牧、农耕、商业并重的独特文化,也正是这种文化使其依旧保持民族特色并使该地区“回鹘化”,推动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没有像大多数北方民族放弃游牧生产方式后被农耕民族同化。

新疆绿洲文化是以维吾尔人为主体的在适应地域环境和生产方式上产生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吸收融合了原西域各民族的文化因素,在该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由草原文化过渡到以农耕文化为主、草原文化为辅的独特绿洲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中还遗存着不少的草原文化因子。维吾尔民族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开拓进取、自由开放和诚信朴实的,其变迁反映了这个民族适应自然、追求文明的表征,文化的变迁中包涵有一种百折不回的韧性、一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一种包容和变革的创新意识。这就是维吾尔民族至今还保持了相当多的草原文化传统。维吾尔民族这种具有深厚草原文化传统的现象,其实还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具体的生存环境决定的。维吾尔先民在西迁之前,主要都是突厥语族部落中强悍的游牧部落,经历过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也曾经在蒙古草原建立过比较强大的联盟政体和一定规模的城郭,成就过相对发达的草原文化,因此,这个民族血液里天生的草原文化成分,并不可能一下子就淡化干净;二是由于西迁后定居自然环境的恶劣,决定了这个民族固有的草原文化传统还有用武之地;三是因为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文化的作用,促使该民族继续吸收了不少草原游牧部落加盟其中,使民族整体的草原文化传统得到了有效延续。

### 三、新疆绿洲文化是西域历史文化的创新

蒙古兴起后,以高昌为中心的回鹘亦都护王国和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在蒙元帝国的大一统局面下最终以畏兀儿化而定型,这是维吾尔民族在



其漫长的族体过程中所经历的极为独特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回鹘人后裔同雅利安人后裔在塔里木盆地上的一次大融合过程。<sup>[36]</sup>蒙元时期,天山以南先是由中央直辖,天山以北分属几个藩王的汗国和高昌畏兀儿亦都护辖区。后来察合台汗国兴起,几乎统治了整个西域。蒙古汗国内部管理体制,最初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社会色彩,元政府为保护畜牧业的发展,“下令禁畏吾地禽兽孕孳时牧猎”<sup>[37]</sup>。可见,以农业为主的畏兀儿人也颇重视狩猎和畜牧业,以致于破坏了环境,政府才进行控制管理。

明朝时期西域平原和绿洲地带的主要的经济形式以农业为主,临近山区的经济形态仍然是以畜牧业为主。天山北部的别失把力地区“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羊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毡,不避寒暑,坐卧于地……饮食惟肉酪,间食米面,希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不树桑麻,不务耕织,间种糜麦,及为毛布。”<sup>[38]</sup>各农业区也还有大量的游牧民,察合台系诸王混战时期,一个在西域的外国人说“自战乱之后,居民逃散,庐会为墟。远远望去,似乎见到一个建筑得很美的村庄,周围郁郁葱葱;但当你走到跟前,希望能见到村民时,却只有断垣残壁。这里只剩了不多的游牧人,并不种地。原野上除了牧草之外,别无农作物。”<sup>[39]</sup>明朝人记述吐鲁番“人以种植、田猎为业,帐族散处”<sup>[40]</sup>，“秋冬居城郭,春夏随水草孳牧,或山川种田,或打围射猎”。<sup>[41]</sup>统治天山南部的东察合台汗国境内于阗“马多骏,还有骡、独峰驼”。<sup>[42]</sup>察合台系统王公贵戚每年围猎,随从人员动辄数千人,叶尔羌汗国赛德汗曾一次就分给海答儿1.5万只羊。<sup>[43]</sup>

天山以南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有限,“由于畜群繁殖,哈实哈儿(喀什噶尔)的平原和山区的牧场已经不敷应用了。”<sup>[44]</sup>许多蒙古人不得不放弃游牧,从事农业生产。东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在位时强制16万蒙古臣民皈依伊斯兰教,其后元朝时留在新疆的蒙古人逐步融合于畏兀儿人,现代维吾尔民族最终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不愿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迫不断迁徙,直到15世纪才皈依穆斯林,与当地各民族交融,成为维吾尔族的分支,俗称刀郎人。<sup>[45]</sup>刀郎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以及语言特点又与其他维吾尔族人有所不同,其民间舞蹈麦西来普动作刚劲、豪迈、激昂、奔放,节奏性强,具有浓郁的草原情调,与蒙古族的倒喇舞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sup>[46]</sup>到了清朝初期,大部分维吾尔族人成为农民,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成为副业。

蒙古瓦剌部西迁时,统治西域的仍是察合台系后裔宗王,他们同瓦剌人“同宗骨肉”“本同族类”。<sup>[47]</sup>双方既有冲突,也有各种形式的交往。明末清初,西蒙古准噶尔部征服了天山南北,统治大部分西域地区,其文化习俗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统治下的维吾尔族民众。维吾尔族人民为了躲避准噶尔贵族的赋税勒索,曾将牛羊放进深山。<sup>[48]</sup>清朝将军兆惠带兵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听说小和卓的马群在南山放牧。<sup>[49]</sup>乌什阿奇木伯克阿不都拉曾强买马匹和牛羊。<sup>[50]</sup>可见,畜牧业生产在维吾尔群众中仍很重要。

元明时期是回鹘草原文化过渡到维吾尔绿洲农耕文化的时期,蒙古草原文化的注入为促成这一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维吾尔族的绿洲文化当中保留了大量的草原文化因子。明末清初蒙古瓦剌部的文化冲击是这些草原文化因子得以传承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传承到现在的草原文化因子仍在物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对维吾尔族群众发挥着影响,影响着其衣食住行的偏好,也是塑造其粗犷豪放文化性格的重要原因。可见,传承到现在的维吾尔民族草原文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也是塑造其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疆绿洲文化的伦理思想是以天人和谐相处为根本特质的,不仅含有丰富的处理人与自然的精神文化资源,而且具有这方面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以及这一实践活动结下的丰硕果实。在新疆这样一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当我们以历史的目光审视新疆草原经济与文化时,特别是新疆的各种生态环境基本得到保护,形成我国西北的一道有力生态屏障,为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有更深刻的历史感悟。

新疆绿洲文化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新疆绿洲文化传统固有的先进生态理念彰显出新的生命力和价值,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为不可多得的思想源泉。其次,新疆绿洲文化传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认同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对各民族文化的不断延续和发扬光大,这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大团结,构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社会,无论怎样都是不过分的。再次,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时代,新疆绿洲文化传统在新疆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显出来,已经成为新疆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片面强调文化的认知功能、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使文化的发展受到局限,越来越书斋化和意识形态化。我们现在应该转变观念,认真梳理新疆绿洲文化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把草原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产业加以有效利用、开发和建设。事实上,新疆绿洲文化已寓于文化旅游业、文艺演出业、文化娱乐业、广播影视业等文化产业中,成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表现出巨大的潜力和优势。

### 注释:

- [1]徐文海:《草原文学论稿》,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 [2][45]文昊:《一半金黄一半翠绿》,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118、4页。
- [3]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的兴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4—166页。
- [4]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第20页。
- [5]尚衍斌:《西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 [6][7][汉]班固:《汉书》(下册)卷九十六下《西域传》,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1700、1701页。
- [8][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715页。
- [9]郭郭:《山海经注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34页。
- [10][14][17]薛宗正:《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41、

54 页。

[11]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12] [汉]班固:《汉书》(下册)卷九十六下《西域传》,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1691页。

[13] 陈世明、孟楠、高健:《二十四史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史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2页。

[15][16]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629、629页。

[18] [苏联]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潘孟陶译,《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42页。

[19]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1页。

[20] [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八《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70-3271页。

[21] [宋]王钦若、周勳初等校订:《册府元龟》(第十一册)卷九百九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64页。

[22] [唐]杜佑:《通典(二)》,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23]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5页。

[2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六《陆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12页。

[25] [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九《铁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04页。

[26] 王仲瀚:《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11页。

[27] 耿世民:《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28][29] [元]脱脱:《宋史》卷四九〇,刘浦江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94、9695页。

[30][31][33][35] [德]冯·佳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译,吐鲁番地方志编辑室内刊本,1989年,第27、21-22、32、84页。

[32] 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34]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315页。

[36] 李雍:《维吾尔民族源流管窥》,《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4年第Z1期,第97页。

[37] [明]宋濂:《元史》卷十四《本纪第十四》,阎崇东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61页。

[38] [明]陈诚:《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2页。

[39] 钱伯泉、王炳华:《通俗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5页。

[40][41] [明]李承勳:《论土鲁番人贡事》;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一〇〇,转引自陈国华:《关于明代吐鲁番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第27页。

[42] [明]慎樊赏:《四夷广记》,转引自伊斯拉斐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西域饮食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3页。

[43] 李清凌:《西北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44]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46] 文胜:《新疆刀郎》,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47] 杜荣坤、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48][49][50] 钱伯泉、王炳华:《通俗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责任编辑:陶然]